



时殷弘 主编

★〔美〕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商务印书馆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美] 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时殷弘 惠黎文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美)
勒特韦克著;时殷弘,惠黎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5694-6

I. 罗… II. ①勒…②时…③惠… III. 罗马帝国 -
历史 - 研究 - 1 世纪 ~ 3 世纪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11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美] 爱德华·勒特韦克 著

时殷弘 惠黎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94-6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 30.00 元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

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来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头号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殷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前言.....	3
---------	---

导言.....	5
---------	---

第一章 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从奥古斯都到尼禄.....	10
-----------------------	----

一 体系概述	17
--------------	----

二 附庸国	23
-------------	----

三 操控附庸	33
--------------	----

四 军队的战术组织	43
-----------------	----

五 兵力的战略部署	50
-----------------	----

六 结论	53
------------	----

第二章 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

“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从韦斯巴芗到	
---------------------	--

马库斯·奥雷柳斯	55
----------------	----

一 体系概述	60
--------------	----

二 边防:战术层面.....	65
----------------	----

三 边防:战略层面.....	84
----------------	----

四 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116
-----------------	-----

2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五 军队	122
六 结论	131

第三章 纵深防御

三世纪的大危机与新战略	132
一 体系概述	135
二 变化着的威胁	149
三 帝国的新边界	159
四 墙围市镇与硬点防御	164
五 边境部队	175
六 行省部队	178
七 中央野战军	187
八 结论	193

结语

对三种体系的评价	196
----------------	-----

附录

权势和武力:定义和内涵	200
-------------------	-----

注释	205
----------	-----

本书所引著作目录	252
----------------	-----

索引	266
----------	-----

序

ix

本书作者是一位战略分析和当代国际关系专家。由于系统地分析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大战略,他为罗马史学家做了他们自己一直未做的事情。诚然,不乏论述罗马军事主题的书籍和文章;本书作者开列的丰厚的参考书目只是一个文献选录。有着对于一个或另一个时期内各不同部分的帝国战略和政策的敏锐和富有启发的分析,而且它们依然非常可贵。然而,一代或更久以前的手册和通论正在变得过时和不足。在某些著作里见到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如勒特韦克博士提出的那样。无论如何,在过去数十年里,巨量饶有成果的著作已经问世,大多基于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文献,特别是铭文。地方考古学家们的标准已变得更细致,他们的技术更丰富,他们积累了的知识更准确。许多学者集中于勒特韦克博士未直接关注的种种重要问题,例如军队作为罗马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中的一个因素,它的内部结构和征召方式等等。通常,他们研究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期或地区。就我所知,没有可与本书比拟的研究存在。

本书与众不同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的全面和长时性,如它做的那样涵盖了帝国全部和长达几个世纪的一个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种种基本变化;第二在于它集中论说“大战略”;第三在于作者的当代战略分析知识,^x对此极少古代史学家有所知悉;最后在于他就特定问题做的明智和富有见识的判断。他对专著和文章的使用始终保持分辨能力,那是在一位学者冒险步入一个并非他本行的领域时不能被想当然地认作必定做到的。

希望本书不会仅仅由那些已经对罗马帝国感兴趣的人阅读。几个世纪里,甚至在我国开初的几十年里,理论家和卓越的指挥官们一直认为罗

马的军事体制和实践值得研究。这不只是厚古情怀。在其前言里，勒特韦克博士强调战略困境方面我们与罗马人之间的种种相似。它们至少是引发论辩和激励思考的。

没有人会设想有如本书这样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不管多成功——将取消予以被考虑的问题进一步注意的必要。专家们无疑会发现错误，或者对论断持有异议。新资料和新研究将继续面世。亦属自然的是，历史学家们指出复杂性和矛盾，以此对抽象模式做出反应。然而，如果他们决定修改或拒绝在此见到的某些模式，那么他们至少会发觉自己关注在此被清澈地展示了的种种重要问题。

J. F. 吉列姆

于高级研究院

前言

xi

要对罗马帝国的战略性治国方略作一番考察,几乎完全不需要申辩其正当性。在我们的文明史册上,罗马人在大战略领域的成就依然完全未被超越,甚至两千年的技术变迁也未颠覆它的教益。无论如何,罗马史研究是它本身的酬赏。

对一个习惯于国际关系文献的混乱复制、唯科学语言和狭隘地方主义的人来说,罗马历史编纂学那累积的规范、严峻的雅致和世界主义的特性令其耳目一新。而且,这些优点在关于罗马军队和帝国军事史的专门文献中尤其显著。尽管如此,我自己的著作系由对这同一文献的一种尖锐的不满激发起来:考古学家、碑铭研究家、古钱币学家和文本考证学者们以其竭诚劳作揭示了我们的知识依据的信息,但他们往往将大为失当的战略观念应用于自己的证据重构。并非这些学者对最新的系统分析方法茫然无知,或者不明白现代战略思想的内涵;确实,他们的短处不在于陈旧过时,而在于过分现代。

从 19 世纪开初直至广岛被毁,战略思维由拿破仑后的“克劳塞维茨式”观念支配,而且这些观念广泛地渗透了主要兴趣远离军事问题的许多人士的思想。在其粗糙的、大众化了的形态上,这些观念强调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民族间冲突;它们强调在追求决定性结果方面进攻战的首要意义和可取性(从而激发了一种对防御战的反感);它们还蕴含了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一种截然区分。最后,这些观念将首要地位赋予武力之积极使用,那与为外交强制目的而使用武力意象相反。

只是 1945 年往后,由于新的大规模毁伤技术的浮现,大战略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的基本假设才被推翻。我们像罗马人那样,面对的前景不

4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

是决定性冲突,而是一种虽然有限、但经久常在的战争状态。我们像罗马人那样,必须积极保护一个发达社会应对种种不同威胁,而非集中于在战斗中摧毁我们敌人的武力。最重要的是,现代武器的性质要求我们避免使用它们,同时却仍力争开发利用它们充分的外交潜能。这些基本变化的革命性含义迄今还只被朦胧地理解到。因而并不奇怪,即使当代的罗马军事史研究也仍然浸透了一种陈旧过时的战略观。

现代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变更的自相矛盾效应在于,它使我们自己的战略困境变得与罗马人的相近得多。因而就有从现代战略分析观点出发对历史证据的这一重新考察。

致 谢

感谢我的教师、同事和朋友沃尔特·拉克乌尔、罗伯特·塔克、戴维·阿布沙伊尔、詹姆斯·金、乔治·里斯卡、罗伯特·奥斯古德、弗朗西斯·韦斯特和詹姆斯·施莱辛格——*non tamen adeo virtutum sterile saeculum ut non et bona exempla prodidit*。迈克尔·阿隆森、约安·古廷和肖姆·埃德蒙都以不同方式对本书贡献了他们的努力,获得我的感谢和尊敬。我还感谢约瑟夫·斯通斯特里特依据粗略的勾勒画了地图和图表,W.塞思·卡勒斯编纂了索引,凯瑟琳·格罗弗很仔细地用打字机录写了一部难录的文本。

导 言

1

在我们这个紊乱的时代,回溯罗马的帝国治国方略经验以求安慰和教益实属自然。在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不可能有任何类比,但战略领域存在富有教益的相似之处。帝国时代罗马战略的本质并非植根于一类现今业已陈旧的技术,而是植根于我们也有的一种困境。对罗马人如同对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正在演化的文明有两大根本需要,即健全的物质基础与充足的安全。对罗马人如同对我们自己来说,战略性治国方略的易被忘怀的目的是为这文明提供安全,同时不损伤其经济基础的活力,也不损害一个正在演化的政治秩序的稳定。罗马帝国由其独特的长寿显现的历史性成功,反映了这些互相冲突的必需得到调和所达到的高度。那么长久地保证了巨大领土——此后一直动乱不止的地域——的安宁的肯定不只是战场成就。

假如罗马帝国的力量出自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出自优越的指挥才能,或出自较先进的武器技术,那就几乎全无要解释的,虽然有许多要描述。可是它并非如此。罗马的战术差不多总是明智的,但并非与众不同地优越,帝国时代的罗马士兵则并非以其热忱著称。他不是一名立意证明其²男子汉气概的武士,而是一名长期服役、追求升迁的职业军人;他的目的和酬赏不是英雄之死,而是在退役时的一笔解雇授予。罗马的武器远非普遍更为先进,而是经常劣于帝国那么频繁地击败了敌人们使用的那些。帝国的世纪性长存也不可能是由幸运的一连串杰出将才保证的:罗马军队拥有大量称职的士兵和某些伟大的将军,但它的力量出自方法,而非出自偶尔的英才。

帝国的优势——巨大优势——属于全然更为精致的一等:它出自观

念和传统构成的整个复合体,那提供了罗马军力组织的灵魂,并且使帝国的武装权势契合政治目的。战术优先、尚武理想和好战本能之坚定地隶属于政治目的是帝国战略性成功的根本条件。少有例外,那些控制罗马命运的人们避不为追求纯战术目的误用武力,也不为无谓的胜利的心理报偿而这么做。至少在帝国时代,武力被清楚地认作它确实是那样,即一种本质上有限的权势工具,代价高昂,且易损坏。最好是保存武力和间接使用军事权势,将其当作政治战工具。

与金钱和操纵性外交一起,显然随时可战、但是备而不发的武力能够在那些可能协同威胁帝国的人中间促发不和,阻止那些不如此就将进攻的人,并且通过恫吓来控制领土和人民——最好甚至达到能取得足够安全甚或有效统治而全不使用任何武力的地步。经过在早先的共和时代学会如何以十足的战术实力击败邻人,然后经过与迦太基人打仗期间掌握大规模战争的复杂战略,罗马人最终懂得了军事力量的最合意使用根本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确实,他们以极少战役和大量强制性外交征服了整个希腊化世界。

同样的保存武力的努力在战争中也显而易见——见于战术层次。理想的罗马将军不是一个英雄样式的人物,率领其部队不计后果地冲锋陷阵,直至胜利或死亡。相反,他会以一种缓慢和经过细致准备的进军向前推进,每夜修筑在他身后的供给道路和有工事设防的兵营军寨,以免敌人突袭的难以预测的风险。他宁愿让敌人撤入设防阵地,而不愿接受正面大打的必不可免的损失,并且会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中等待饿垮敌人,而不遭受在以猛攻夺占要塞时的巨大伤亡。克服了一种仍然含有希腊尚武理想的文化精神(那最鲁莽妄动的人亚历山大大帝实际上是许多罗马家族的崇拜对象),罗马的伟大将领以其极端审慎著称。

恰恰是罗马战术的这个方面(除了大为倚赖工程战之外)解释了行进中的罗马大军的严酷不懈性质,连同他们在逆境中的坚韧不屈:罗马人得胜缓慢,但击败他们难上加难。

正如罗马人分明无需一个克劳塞维茨将其军事精力从属于政治目的

的规范,看来他们也无需现代分析技艺。罗马人尽管全然不知新的“系统分析”科学,但设计和造就了巨大复杂的安全体系,它将部队部署、固定防御、道路网络和信号联系成功地整合进一个内在连贯的整体。在更抽象的战略领域,显然不管是由于智力还是由于传统本能,罗马人理解威慑的所有精致玄妙,也懂得它的种种局限。最重要的是,罗马人清楚地认识到,权势的主宰方面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理的:是他人关于罗马力量的意念的产物,而非使用这力量的结果。只有这一认识,才能解释罗马战略在其最佳形态上的精致性。

公元70年至73年对马萨达的围困透露了一种基于威慑的长远安全政策的极精致运作。面对几百个犹太人的抵抗——在位于全无战略或经济重要性的犹地亚沙漠的一座山丘上,罗马人本可部署几百人看守造反者,以此将他们隔绝起来。驻扎在附近的艾因吉蒂泉,一支罗马骑兵分队本可耐心等待那些犹太人耗尽其饮水补充。不然的话,罗马人还可以猛攻山上要塞。犹太战争已经被根本打赢,只有马萨达仍在坚持抵挡;然而,这一抵抗火星可能随时重燃造反大火。马萨达山坡面陡峭,而且犹太人是可怕的战士,但是有几千人从四面八方进逼,防御者本不可能长时间挡住进攻者,虽然他们可以杀死许多人。

罗马人未做所有这些事。他们没有去饿垮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没有猛攻山丘。相反,在全部罗马军队总共仅有29个军团去驻防帝国全境之际,一个军团被部署围困马萨达,在那里依靠庞大的工程劳作制服要塞,包括堆造一个巨型斜坡直达山顶。这是一番巨大的、似乎非理性的紧缺军事人力投入——果真如此?这整个三年的行动,连同其目标的无关紧要,必定给东方所有那些可能非如此便禁不住要想造反的人造成了一个不祥的印象:马萨达的教训是罗马人会穷追叛乱,甚至追到位于远远沙漠的山顶,以摧毁其最后残余,而不管代价如何。而且,犹如确保这一信息被充分聆听,并且被充分记牢,约瑟夫斯被安顿在罗马,在那里他写下了关于这场围困的详细记述,那以希腊文——约瑟夫斯学会了的语言——和东罗马的语言发表。

马萨达行动是一场深谋远虑的心理战行动:这一提法当然是猜测。然而,其他的解释不可置信,因为在实施围困方面的纯粹盲顽完全不符我们就战争当事者所知的一切,其中特别是韦斯巴芗——最讲求实际的人,其首要美德为精明的寻常意识的皇帝。

我们不需依靠猜测来相当详细地重现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罗马帝国治国方略的基本特色,那是本项研究的主题。对理解政策的详细操作及其动机必不可少的叙事资料来源可惜不完全,而且有时可疑。然而,一代代学者的劳作已经产生了巨量详细证据,那是关于帝国战略之物质要素即军队兵力结构、边防格局和各要塞分布的。与此同时,就罗马外交的突出事件和一般性质已知的够多,能组成一幅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的整个帝国治国方略图景。

纵贯这一时代,三个不同的帝国安全体系可以被辨识出来。我们可以合适地谈论体系,因为它们每个都整合了外交、军事力量、道路网络和防御工事,以服务于一个单独的目的。不仅如此,每一要素的设计都反映了整体的逻辑。每个体系意在满足一套不同的轻重缓急次序,而后者本身又反映变化中的帝国观念:对第一个体系来说优先的是霸权扩张主义;对第二个来说是领土安全;最后,在收缩了的环境里,优先的是帝国权势本身的绝对生存。每个体系基于外交、直接武力和固定的基础设施的一种不同的结合,每个还包含不同的操作方法;然而更基本的是,每个体系

5 反映一种不同的罗马世界观和自我意象。

以非常粗糙的简单方式,或许可以说依凭第一个体系,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征服多多,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那些生活在罗马城里的人的利益,而且事实上是更少数人,即那些处于最佳的地位去控制政策的人。公元一世纪期间,罗马思想向一种广泛得多、而且全然较仁慈的帝国概念演进。在第二个体系的庇护下,出身于远离罗马的地方的人们可以自称为罗马人,而且使自己的权利要求被充分准许;边境得到有效的防御,以保护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特权者的愈益兴旺。结果是公元二世纪的帝国,它服务于几百万人而非几千人的利益。

在随公元三世纪的大危机而被组织起来的第三个体系之下,提供安全成了对社会的一种愈益沉重的索取,一种被不均衡地分配的索取,那可以令富人更富和令穷人潦倒毁灭。帝国机器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益自利,其收税者、行政管理者和军人对各自互相的用处比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用处大得多。即使那时,帝国仍保有许多人的忠诚,因为否则就是混乱。当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下去,当被组织起来、能够提供一定程度安全的蛮族国家开始出现在曾是罗马人的土地上的时候,这最后一个帝国安全体系丧失了它的最后支持,即人对未知物的恐惧。

第一章 朱利乌斯 - 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从奥古斯都到尼禄

第一个帝国安全体系本质上是共和国晚期的体系，虽然它在以“元首政治”(principate)为我们所知的那种特殊专制形态之下，延续进了公元一世纪。由本人系政体含混大师的屋大维一派创立，“元首政治”形为共和，实乃专制。行政长官一如先前任职，以监督公共生活，元老院也一如先前就座，似乎掌管罗马城和帝国。然而，真正的控制权现今握在屋大维一家和他的个人协从手里，而屋大维是朱利乌斯·凯撒的亲戚和继承人，也是以凯撒被刺开始、以公元前30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终告失败结束的内战的最后胜利者。

独裁者朱利乌斯·凯撒推翻了虚弱的共和国体制。他的在亚克兴战役后全权在握的继承人恢复并随即颠覆了共和国。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取名奥古斯都，带有半宗教权威的意味；罗马有了一位新主人。理论上，奥古斯都只是“首席公民”(princeps)，但这是一位控制所有行政长官人选8 和所有军队指挥权的公民。既非东方专制君主，亦非身为活人的神，“首席公民”在理论上仍受法律约束，服从元老院的意志。然而由奥古斯都控制的直接权力，即他的军团权力，远甚于元老院的权威，元老们则以其急切的服从承认这权力。

在奥古斯都治下，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共和国扩张主义两个世纪的巨大但分散的征服便被圆满完成，并且得到巩固。到公元前25年，西班牙已被充分占领，三个行省(巴埃蒂卡、卢西塔尼亚和塔尔拉科楠西)被组建起来，虽然最后的当地人造反直至公元前19年为止没有被镇压下去。由凯撒征服但未为征税而予以组织的高卢内地被构建为三个新行省——